

论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

——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

邵伯周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当然是经典性的科学论断。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应该说鲁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作为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个逐步深化和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下面试略加论述。

“立人”

——鲁迅的早期人道主义思想

鲁迅到日本留学的初期，就经常考虑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鲁迅之所以经常考虑这三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家民族的命运正处在非常危急的关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国民愚昧落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如何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感到非常焦虑。思考的结果，他把解决问题的办法落实到人的问题上。他所考虑的三个问题，就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如何使人的个性得到正常、健全发展的问题，但这并不仅仅是单个人的问题，而是国民的整体问题，也就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问题。他弃医从文的行动和1907年间写的几篇论文，更充分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也就是“立人”的思想。

在1906年前后，革命派与改良派就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展开激烈论争时，鲁迅是支持革命派的，并参加光复会的活动。但在思想路线上，他却独树一帜。他批判那些“钩爪锯牙”和“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等主张，认为那些都不是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办法。他认为根本办法是在“改造国民性”——改变人的精神状态、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质，所

以，他高举“立人”的旗帜。他认为，“欧英之强”，“根柢在人”。要使国家民族“生存雨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道术”（方法）则是“尊个性而张精神”。^②在当时的鲁迅看来，只要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变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张大个性”，成为“勇猛无畏，独立自强”的人，也就是“人”的素质提高了，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有可能做到“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与此同时，个人的精神奋发了，“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

鲁迅当时对被压迫的弱小国家与民族怀有深切的同情。他密切注视着波兰、印度等国家的命运，表示“使二国而危者，吾当为之抑郁；二国而隳，吾当为之号咷”。并立志要“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由具足”。他斥责那些假“爱国”之名，“进行杀戮攻守，思廓其困成于天下者”为“兽性之爱国”。^③这表明鲁迅不仅寄同情于弱小国家、民族，并愿意与他们共同反对侵略，此外鲁迅与弱小国家、民族休戚相关的思想感情，与他的“立人”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鲁迅当时虽然已注意到社会改革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但如何从根本上来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获得民族的解放，却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他

①《怀旧友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②《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4页，1981年版。

③《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3页，

提出的“立人”主帐，作为救国的方案来看，实质上还是精神改造的方案，与进化论和尼采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又有所不同。作为他的整体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道主义思想，其主导倾向还是与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鲁迅中期的人道主义思想

鲁迅1918年5月发表的第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创作小说《狂人日记》，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吃人”本质，他期望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吃人者”的理想社会，一个“真的人”的社会。他热切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声。《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以后，鲁迅在他的一些杂文和小说中，更多方面、多层次地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杂文中，鲁迅正面表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要求之一。反对旧道德，就是反对“三纲五常”、贞节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提倡新道德，就是要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1918年间，在怎样对待子女的问题上，鲁迅从“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这一基本观点作出回答。他认为人类都有“爱己”的本性。

“爱己”，“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他还认为父母对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使子女成为“独立的人”。他更指出人类还有比动物更高几等的天性，就是希望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这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这种本性，也就“爱”。他希望“觉醒的人”，应将这种“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换句话说，就是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①鲁迅的这些主帐，表面看来，只是怎样做父亲的问题，立论的出发点是进化论。但其深层意义却是在指出怎样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使下一代成为完全解放、完全独立的人，成为“超越自己，超越过去”的“新人”。这是对下一代，对民族，对人类未来的热切关怀，体现了最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

1925年4月，鲁迅在批判复古主义时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还是鬼，……全都踏倒它。”②5月，他在回答青年人应当有怎样的目标时又强调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③“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显然是从“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这一观点发展过来的。过去不少研究者把这看作仅仅是进化论思想的体现。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很不充分的。鲁迅提出“生存、温饱、发展”这一要求，实质上是为维护最基本的人权而斗争，这既是个人人权，又是国家和民族的集体人权。可以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是这一时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

鲁迅还从正面论述了他对入道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尚未成人，入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同时，他又指出：天上“决不会掉下入道来，因为入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④鲁迅既相信入道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又指出是必须努力去争取的。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要去争取，这就把人道主义和行善布施的怜悯主义区别开来了。

那么，怎样争取人道的实现呢？对于这个问题，鲁迅针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回答。他认为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进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⑤所谓“第三样时代”，就是奴隶们，也就是被压迫者不再被“吃”的时代，也就是人被看作是人，享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时代。这是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当然，这种理想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鲁迅当时还不是十分明白的。

鲁迅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同样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前面提到，《狂人日记》就是一篇人道主义宣言。在名篇《阿Q正传》中，鲁迅正是以“哀其不

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129页。

②《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46页。

③《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51页。

④《随感录六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358页。

⑤《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0页。

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了阿Q这个没有“人”的地位、没有“人”的尊严，甚至连“生存”和“温饱”的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不要说“发展”，最后连生命都被剥夺了的“人物”形象。从而有力地抨击了那个“不把人当人”的封建社会，为被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甚至生命，还得不到同情的阿Q这样的人提出了热切的申诉。这正是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明天》、《祝福》、《离婚》等小说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从不同的侧面作了深刻的揭露，对被压迫被侮辱甚至被“吃掉”的劳动妇女寄予深厚的同情。在《伤逝》中，鲁迅既热情地肯定了“个性解放”要求，又指出这一思想不能给青年男女、特别是不能给妇女幸福的局限性，更显示了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性。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拿起笔来作小说是要使“昏睡”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的人们惊醒起来，“毁坏这铁屋”。①后来他又说他创作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这说明鲁迅从事创作小说正是为了促进社会变革。他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从属于要求社会变革这一基本思想的，但他并没有放弃“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如果说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正面表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那么，在他的小说中则以人物形象和融注在人物形象身上以及作品字里行间的主体意识来表达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见鲁迅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已超越了“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而有了新的内涵，即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尽管鲁迅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作为救国救民的方案来看，他已把精神改造和要求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了。

“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

——鲁迅后期的人道主义思想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界发生了新的分化与组合。创造社（后期）和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文学的阶级性等等。但由于他们受到国际共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左”倾路线以及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的影响，片面强调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甚至否定人道主义。“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则以“永久不变的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时期的鲁迅，已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虽然他不再一

般地谈“改造国民性”和人道主义，但他并不是从根本上为弃了原来的观点，而是赋予原来的观点以新的内涵，从而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鲁迅针对梁实秋的“人性是永久不变”的观点，指出人性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③他又针对一些人片面强调阶级性、把阶级性绝对化的观点，肯定人性是“带有”阶级性的，但只是“都带”，而非“只有”。④这就辩证地说明了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所以他对文化史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就能作出具体分析，既有所肯定，又指出其局限性。比如他对托尔斯泰就是这样。“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鲁迅是加以肯定的，托尔斯泰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叫士兵放下武器不替皇帝打仗，鲁迅就指出这是行不通的。⑤鲁迅还指出，“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⑥他还针对当时某些人反对人道主义的情况，以极其愤慨的语气讲过以下的话：

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了。不过我想，当反革命者大屠杀革命者，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这对于革命为什么会有损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也吓得不敢响一声，或者还是没有想出另外的好方法呢？……我想，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而另外的好方法也似乎想不出来，除去明白的直接的斗争。倘一面骂人道主义，一面又不斗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⑦

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效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的。除非也有刀在手里，但那样，岂不是大悖他们的主义，倒在实行阶级斗争了吗？于是，就反而要如“托尔斯泰样”

①《呐喊·自序》。

②《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511页。

③《文学和出汗》，《鲁迅全集》第3卷557页。

④《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125页。

⑤《文学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113页。

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105页。

⑦冯雪峰：《回忆鲁迅》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Tolstoyan, 托尔斯泰主义者或托尔斯泰信徒的意思)一般,倒只向革命者要求人道主义了。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①

在这里,鲁迅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也指出了他的局限性。鲁迅说的“无用的人道主义”是指伪善的人道主义、浅薄的人道主义。“真的人道主义”则是指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两段话表明,鲁迅是把两种人道主义区别开来的。在鲁迅看来,在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伪善的人道主义、浅薄的人道主义是无用的,而“真的人道主义”,即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并不反对用“刀”的,即并不反对用暴力(革命手段)的,不仅不反对,还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对付那些压迫者和吃人者。鲁迅认识到,用暴力,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和剥削,就是实行“真的人道主义”,即无产阶级人道主义。

其次,鲁迅不仅爱憎分明,并且一再强调要把爱憎统一起来。他说:文人应该“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泰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斩断他的肋骨。”^②他又说:“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③鲁迅这两段话的意思概括起来说,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因为鲁迅深刻地认识到:“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④爱和憎,是一种感情的两个侧面,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两个侧面。对人民、对被压迫者,给予热烈的爱,对人民的敌人、压迫者,则给予彻底的憎恶。这正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后期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鲁迅当时写了不少这一类杂文,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和日本帝国主义反人性反人道的侵略行为。这是人民的控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控诉。

鲁迅还把他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寄托在无助无告的弱者身上。例如《论秦理斋夫人事》,就从普通职员秦理斋的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

口自杀的悲剧,谈到“穷乡僻壤及都会中,孤儿寡母,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的普遍存在,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对于迫使弱者走向绝路的黑暗社会给予无情的抨击。特别是,“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的人,鲁迅更愤慨地指出,“纵使如何义形于色”,“其实乃杀人者的帮凶而已”。鲁迅的这些分析,字里行间也是洋溢着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爱憎感情。此外,鲁迅后期的几篇历史小说,如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处理历史题材的《非攻》和《理水》,也是张扬了人道主义思想的。

再次,鲁迅在这一时期确立了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最高境界。

鲁迅曾经明白地宣告,他“原先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只是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⑤他认为在新兴的无产者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在那个社会里,“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⑥这就是说,鲁迅根据他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当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判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千百万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各项设施都符合“人情”,人们的生活都“像了人样”的社会。鲁迅是相信将来的“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是最符合人道主义要求的社会,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可见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是一贯的,又是发展的。

说一贯,是说鲁迅从开始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始到他的晚年,人道主义始终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贯的内涵是:一、揭露和控诉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得到解

(下转第114页)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

②《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335页。

③《七论“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405页。

④《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451页。

⑤《二心集·序》,《鲁迅全集》第4卷189页。

⑥《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鲁迅全集》第4卷424页。

在唐宋诗词艺术意境中的徘徊和早期创作中清新素淡的文笔,以及在狭窄天地间盛怀往昔、在反省遐思中讨生活等特点,初步形成了施蛰存灵巧、细致的文学风格。这些经验帮助他从小显尼志勒的文风情调中找到相似的呼应。他所欣赏并力求达到的,正是显尼志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微妙的欢乐,纤细的感情”、以及“科学者的精神分析”与“绅士底得意的文雅态度”的写作准则。^①有人曾将显氏为代表的这种维也纳文学趣味冠名为“薄暮情调”,^②意即黄昏时分,一位年青女子,心事萦牵,偷偷啜泣的情味。追忆与回顾、憧憬与想像、沉思与伤感,成了他们内心生活的全部内容。广义而言,在施蛰存笔下作着心理分析的女性,大都充满着“薄暮的情调”;相对于他们的行动来说,心理变化的过程显得更为重要。

其次,是文学表现上心理分析方法和内心独白形式的影响。这是显氏刻画女性性爱心理时最主要的表现方法,也在施蛰存的借鉴创作中取得了成功。他特别注意显氏描写性爱,“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说行为”,而是“注重在性心理分析”。^③这一观点划清了与自然主义方法的界限,因而使得他即使在描写变态性心理时,其基本态度仍是认真严肃的,与张资平、叶灵凤、邵洵美等人纯色欲的直接描写绝不相同。当然,至于“象劳伦斯那样,理直气壮地”写爱情与性欲,将之作为歌颂生命力的伟大创造精神而与资本主义虚伪道德相抗衡,作为一种生命哲学而加以提倡,自在施蛰存的心理分析中也是看不到的。在心理分析的文学观念上,他没有超过显尼志勒的世界。即使是从显尼志

勒那里学到的心理分析,也与“意识流”小说的艺术表现有所不同。后者由于受到詹姆斯心理学说和柏格森关于时空交错的理论观点的影响,而出现诸如《尤利西斯》和伍尔夫小说那样含义极广、处于自动、无序状态的意识流动表现。施蛰存接受了显尼志勒的表现特色,他的心理意识的开掘,总是围绕具体的事件和实在的人物,因而意识的对象与主题显得明晰、集中。

总之,施蛰存是由于共同的艺术情趣和表现的风格而接近了显尼志勒,甚至在多方面的借鉴学习中还恪守了显氏固有的立场、方法和眼光。作为一个例外,是各自文艺观所代表的哲学思想有所不同。显尼志勒的文艺观,是一种对于人类命运持怀疑论态度的人生哲学。因而在他忧郁的笔下,美好的事物与生命,总是遭受不幸,在爱与死的角逐中,代表善良与正义的女性总是蒙受灾难,乃至悲惨死去。这种对于妇女倾注了更多同情与爱心的艺术选择,也在施蛰存的创作里得到了呼应。但显氏上述的哲学观念,则使他超越了浪漫而轻柔的维也纳趣味,体现出一种忧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严肃的人生批判态度。虽然这样的认识还不能帮助真正理解社会的实质,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通过文学观照,而上升到社会与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就此而言,施蛰存小说中仅有的一些社会批判,尚未达到如此的理性高度。

①②施蛰存:《妇心三部曲·序》,神州国光社,1931年。

③刘大杰《苦恋·序》,中华书局,1932年。

(上接第109页)

放,获得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二、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和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要求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生存、温饱发展的权利。三、反对一切反人性、反人道的行为,包括侵略战争,要求维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鲁迅的这些观点,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说发展,是说在鲁迅人生历程的不同历史阶段,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又不完全相同;在早期,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立人”。虽然他已注意到社会改革的重要性,但他还是把“立人”——“改造国民性”,即提高人的素质工作看作是第一位的工作。这是和他接受进化论和尼采思想的影响有关的,也是和启蒙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

结合在一起的。在中期,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生存、温饱和发展”。这里包括对人的要求和民族的要求。他一方面继续把“改造国民性”一提高人的素质放在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已看到变革社会制度,包括用革命的方式变革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了。他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的。后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为了无阶级社会”。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这是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相一致的。显然,鲁迅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